

本集刊为中国知网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论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亚太跨学科 翻译研究

(第六辑)

主编：罗选民

06

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

学出版社

亚太跨学科 翻译研究

(第六辑)

主编：罗选民

06

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 第六辑 / 罗选民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6

ISBN 978-7-302-51147-2

I. ①亚… II. ①罗… III. ①翻译-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2887号

责任编辑：刘细珍

封面设计：覃一彪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宋 林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铭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10.5 字 数：191千字

版 次：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5.00元

产品编号：078736-01

主办单位 / SPONSORS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论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主编 / EDITOR IN CHIEF

罗选民

副主编 / ASSOCIATE EDITORS

张旭 李伟荣

主编助理 / EDITORIAL ASSISTANT

李文婕

编委 / EDITORIAL BOARD

Anthony Pym,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Bao Chuanyun,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 USA
Edwin Gentzler,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USA
Frank Austermuehl,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Henrik Gottlieb,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nmark
Isabelle Rebut,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France
Jeremy Munday, University of Leeds, UK
Lawrence Venuti, Temple University, USA
Luise von Flotow,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Michael G. Watson,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Japan
Phrae Chittiphalangsri,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Robert Neather,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Vicente Rafae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Xie Shaobo,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Zheng Bingham, Durham University, UK
陈国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刘士聪, 南开大学
刘树森, 北京大学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单德兴, 台湾中研院
孙艺风, 香港岭南大学
谭载喜, 香港浸会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 宁, 清华大学
谢天振,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许 钧, 南京大学
杨承淑, 台湾辅仁大学
仲伟合, 澳门城市大学

编者的话

本辑是《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的第六辑。除一贯关注的中国文学外译议题之外，本辑还增设了一个新的栏目——“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用以关注并鼓励常被视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翻译相关研究。这一研究领域也将成为本集刊长期关注的主题之一，希望以此引起学界对于儿童文学翻译这一在中国翻译研究界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研究领域的更多关切与探究。

本辑共收录 12 篇论文，共设五个栏目：集刊特稿、理论探讨、案例分析、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学术动态。

本辑特稿为罗选民教授的文章《译诗“可以兴，可以怨”——谈江枫先生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在深入对比分析了江枫诗歌译文与原文以及其他中文译本之后，特别是对江译的形神兼备、意象词、颜色词的处理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之后，罗选民提出，尽管“形似而后神似”这一诗歌翻译原则并非为江枫所首倡，但他将这一诗歌翻译的主张最大化地运用在他的诗歌翻译之中。在对江枫诗歌翻译的技巧以及原则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罗选民进一步指出，与诗歌创作一样，译诗也可以充分激发情感，抒人间万象，激励人们忘记痛苦，追求光明。故此，译诗亦“可以兴，可以怨”。不仅如此，优秀的诗歌译本使得外国诗歌“融入中国文学土壤之中，并沉淀成为文学精品”。但同时他也指出，与诗歌创作不同的是，译诗必须建立在“形似而后神似”的基础之上。江枫一生在诗歌翻译领域建树卓越，留下了许多已被奉为经典的诗歌译本。然而，结合其译作对其翻译思想进行深入分析的研究目前尚不够全面与丰富。罗选民的研究无疑加深了对江枫这一著名翻译家的译作与翻译思想的了解，亦是对江枫先生仙逝的最好纪念。

理论探讨栏目中收录了吕世生、司显柱以及余蕾的三篇文章。吕世生在其文章中分析、对比了中国人民大学团队的中国戏曲译本和阿林顿、艾克敦合译的中国戏曲译本，发现两者的译本呈现了不同特征。通过文本的对比分析，作者发现译本所呈现出的不同特征往往与译者的文化身份相关，中国文化身份译者更关注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而西方文化身份译者更关注译文的接受。在对阿林顿、艾克敦译本进行深入的分析之后，作者指出二人在翻译时多采用改写与“比附”等策略，这种策略反映了译者的多元文化立场及他们对中国戏曲外译的理想与现实的理性权衡，对于中国戏曲“走出去”的翻译具有方法论价值。吕世生的研究在译者文化身份对于翻

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探寻与思考,并且在这一思考的启发下提出从身处目的语文化的译者以及读者的角度来考量中国文学文化外译的有效策略,这种换位思考的视角值得更多学者参考。在《评价、介入、级差:评价理论在翻译中的整体应用》一文中,司显柱首先对已有的将评价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尝试做了细致的梳理与评价,指出现有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既表现在研究方法的多维,也体现于研究语料类型的拓宽、多样。然而,作者同时指出绝大多数已有研究集中于评价资源中态度系统对翻译的启示和应用,而对介入和级差系统的探讨却很少。基于此判断,司显柱的文章聚焦于介入和级差系统,讨论这两大系统之于翻译研究和实践的价值。通过对一系列语言实例所表达的评判意义的分析,作者指出评价意义是语篇所承载全部意义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翻译过程中,实现评价意义的对等转换是译者所面临的重要责任。因此以语言的评价系统为研究对象的评价理论之于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启示和指导意义不容置喙:它既能在词汇、语法层面为我们对源语语篇所蕴含的评价意义的识别以及在目的语语篇中的转换和再现提供系统的、看得见的工具;同时,也为我们深入考察和探讨作者的主体性、译者的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提供了手段,值得深入探讨。本栏目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对于法庭口译中概括口译现象的理论研究。在题为《中国大陆刑事审判语境下法庭口译中概括口译现象研究》的这篇文章中,作者余蕾结合自身的长期实践指出,概括口译因为在准确性方面的天然缺陷,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不适宜在法庭口译中运用。然而,余蕾的研究却对这种简单化、规定性判断提出了挑战。余蕾通过民俗志研究途径搜集到大量中国刑事庭审语境下的法庭口译语料,在对这些语料中的概括口译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比较之后,其将概括口译的现象区分为三种不同类别:主动概括、被动概括和习惯性概括。文中提出“被动概括口译”这一概念,着重分析了这一现象并对其进行了规定性描述。作者揭示了此种现象的产生并非缘于口译员能力不足或不负责任,而是口译员对语境中制度性因素被动顺应的结果。最后,作者提出在现阶段庭审实践中概括口译现象难以避免且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因此在制定口译质量标准以及对口译员的追责条款时,要考虑到由于被动概括口译而造成了不良后果时应当对口译员相应减责甚至免责。法庭口译研究是与行业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领域,余蕾的研究从理论梳理和行业实践观察两个方面出发,使理论的研究与行业实践紧密结合并且试图以研究带动实践的发展,实属可贵的尝试。

案例分析栏目共收录五篇论文。其中白靖宇与席婧的研究考察了 1582 至 1723 年间,早期来华传教士科技文献译介活动。他们认为在中国翻译史上,明末清初(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中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来华传教士开展了

一场持续近两个世纪之久的科技文献译介活动。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早期来华传教士群体奉行“科学传教”的方针，将欧洲大量科技文献翻译介绍到中国社会，形成了一次科技文献译著高潮。而这场科技文献译介活动打破了中国与世界隔绝的局面，启迪了国人的科学思想意识，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该研究不仅梳理了翻译史实与译本，还在此基础上从科技贡献与社会文化两个方面剖析了这一时期的西方科技文献中译活动对于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同时，此研究也指出，特殊的译者身份与特定的中国社会环境使得目的语文化对早期传教士的译介活动产生了质疑与戒备，也进一步导致了目的语文化对于传教士译介行为的抵制与禁绝。在本案例研究中，翻译活动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互动得到了观照，这种研究视角值得更多学者同行们进一步关注。崔艳秋与洪化清的文章《译者与作者的共谋：政治、审美与〈天堂蒜薹之歌〉的改写》讨论了《天堂蒜薹之歌》英译版里的改写现象。在比较了该书 1989 年台湾洪范书店的版本与 2009 年中国大陆出版的版本，同时比照葛浩文的英译版之后，作者提出，在政治审美和文学审美视角下，为了适应西方读者的文学规约与意识形态，葛浩文在翻译时对莫言原作部分章节内容进行了删节、简写、扩写并淡化了原文所包含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些翻译手段反映出译者在作品重构与域外传播中的主体性地位。而另一方面，本文也通过分析指出，作者莫言对于译者对其作品翻译中的改写或删节不以为忤，愿意为海外读者提供不同的版本，这种开放的心态和文化情怀令人赞赏，也值得其他作家学习。文章认为，译者与作者这种近乎圆满的合作是二者共谋的结果。而这一结果也表明如果作者和译者均能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共同打造精品译本，他们的共同努力将使中国文学在异域葆有延续的生命力。杨超的研究以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世界书局出版的三种翻译教科书为研究对象，介绍了它们的主要内容，评析了它们的共性和特点，也在结合翻译研究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从当下的视角指出了三种翻译教科书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此外，文章还指出，民国时期世界书局出版的这三种教科书对于当前翻译教科书编纂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建设性的价值。尤其是在如何针对不同目标读者编纂出高质量的翻译教科书这个方面，这三种民国教科书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答案。杨超的研究以民国翻译教材为切入点，开展翻译史研究，还原其时大中专学生翻译学习的原貌与全景，选题十分新颖。倘若此研究能启发更多研究者扩大研究视野，将更多民国翻译教材纳入研究对象，一定会对翻译史研究以及翻译教学研究带来更多的启示。陈顺意、肖坤学两位的文章《中国大学英译校名的名与实》从中国大学校名英译的现状出发，基于英、美、澳、加等主要英语国家大学校名的命名规则，探讨中国大学校名英译的原则以及大学校名英译质量评估方法，

以期对中国大学校名英译提供有益的参考,提高英译质量,促进中国大学对外交流,扩大国际影响力。因为高校体系与学科设置的独特传统,中国高校的英文译名一直缺乏统一的翻译标准,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常常给国外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带来理解困难,本文提出的校名翻译原则可兹为规范译名、统一翻译标准的有益尝试。本栏目的最后一篇文章来自新疆学者马丽娟。通过对中国三大少数民族史诗之一《玛纳斯》经典化的研究,作者指出,中国语境下的经典化既强调文本内在价值也注重文本外在影响。《玛纳斯》作为中国三大少数民族共同的史诗,其经典化的实现既有对文本内在价值的保护和传播,又有相关机构的外在推介。文章指出,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与西方世界的种族政策不同,同时中国翻译思想又深受中庸之道影响,故中国语境下的经典化形成有其自身特点,其经典化的模式也因此具有不言而喻的学术意义。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经典的外译研究尚未倾注相当的关切,也暂未产出丰硕高质的成果,马丽娟的研究与学术关注立意高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先行的学术意义。

本辑新增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栏目并且收录了两篇相关文章。其中张生珍与李小蕾的文章全面介绍了中国大陆地区专为儿童文学设立的奖项、其他奖项中的儿童文学奖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儿童文学奖,并在此基础上以知名获奖作家为例探讨了中国儿童文学奖的深远影响。文章指出,中国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传播起到了正面引导作用。获奖作品能够坚持为国家服务的设奖初衷,为传播主流价值观和弘扬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总体而言,设立中国儿童文学奖的主要目标已接近实现,但是同时中国儿童文学奖的国际影响力仍有待提高,其距离经典化与国际化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徐德荣与修小力的文章《论儿童幻想小说翻译中的童趣再造》深入研究了儿童文学中所包含的“童趣”这一文体特征,指出童趣是构成儿童幻想小说价值和魅力的核心要素。通过丰富的译例分析,文章指出,儿童幻想小说翻译中童趣再现的不足甚至缺失会大大影响翻译的质量与读者的接受。而要想让儿童幻想小说译本继续散发迷人光彩,最重要的就是实现“童趣”的再造。因此,儿童文学翻译工作者首先要对儿童幻想小说树立敏锐的文体自觉意识,增强“儿童本位”意识,正确运用符号学意义观进行意义的全面再生,再现原文的童趣,以最大程度实现儿童幻想小说文本的“等效”翻译。文学翻译实践中,对于原文中所包含的包括“幽默”在内的个性化文体特征的传译与再造一直是对于译者文学修养的最重大挑战之一。徐德荣与修小力的研究试图从符号学的视角,为这一翻译难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实为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有益尝试。

最后,在本期学术动态栏目中,王少爽与高乾对《心理语言学与认知科学视域下的口笔译探究》一书进行了述评。在详细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之后,作者对该书的学术贡献做了细致深入的归纳,指出该书系统阐述了心理语言学与认知科学对口笔译研究的贡献,科学地构建了口笔译过程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深化并开拓了口笔译研究的疆域,并且指出了口笔译认知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文章也指出了该书仍存在的些许缺憾。作者的评述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与严谨批判的学术眼光,可为对相关领域研究感兴趣的学者提供有益的、负责的导读与介绍。本栏目的另一篇书评与诗歌翻译研究相关。在《其人·其诗·其译:穆旦研究的系统化探索》一文中,林嘉新与周子淳对《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一书进行了评介。在深入阅读该书以及广泛涉猎相关学术文献的基础上,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尽管国内穆旦研究不断发展并取得丰富成果,但有关穆旦生平、诗歌创作、诗歌翻译之间联系与相互影响的研究仍有待加强。王宏印 2016 年出版的《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对穆旦其人、其诗、其译进行了系统化探索,回应了这方面的研究需求,因此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文章指出,该书强调诗人穆旦和翻译家查良铮的双重身份,有助于全面了解穆旦诗歌著译的艺术特征、动因和过程等,进而推动穆旦研究进一步发展。文章的最后特别分析指出了该书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的主要特征与价值,认为该书所反映的诗史互证及语境化的研究方法凸显了其人、其诗、其译的复杂关联,所包含的全面扎实的文本研究则彰显了穆旦诗歌著译的艺术成就,而整体分析与案例研究结合,有助于深入解析穆旦的诗歌著译过程,史料钩沉与分析又展现了穆旦的文论者形象。此评介文章避免了“就书论书”的窠臼,而是结合自身学术观察与体悟以及诗歌翻译研究的最新理论进展,对王宏印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的阅读与负责任的批评,可谓为真诚热情的学术评论。

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出,本集刊继续秉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关注与学界研究热点相结合的宗旨,提倡并鼓励以新的理论与方法论视角介入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而本集刊所关注的学术议题也愈加多元与丰富。希望我们的努力能有助于进一步拓宽翻译研究的广度、加深翻译研究的深度,同时促成越来越多的学术创新成果的涌现。在此,我们要感谢学界同仁对本集刊的热情支持。同时本集刊编辑部还要感谢为本辑出版付出极大心力和时间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刘细珍副编审以及本集刊的主编助理李文婕博士。我们将继续坚持本集刊的办刊宗旨,以不负先学前辈与学术同侪的厚望。

主编:罗选民

2018 年 6 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v

集刊特稿

罗选民

译诗“可以兴，可以怨”

——谈江枫先生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 1

理论探讨

吕世生

中国古典戏曲外译的译者文化身份、文本选择与阐释 8

司显柱

评价、介入、级差：评价理论在翻译中的整体应用 18

余 蕾

中国大陆刑事审判语境下法庭口译中概括口译现象研究 32

案例分析

白靖宇 席 婧

早期来华传教士科技文献译介活动考察（1582—1723） 48

崔艳秋 洪化清

译者与作者的共谋：政治、审美与《天堂蒜薹之歌》的改写 64

杨 超

浅评民国时期世界书局三种翻译教科书 76

陈顺意 肖坤学

中国大学英译校名的名与实 86

马丽娟

Exploring Mode of Canonization in Chinese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Manas*, A Chinese Ethnic Epic 102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张生珍 李小蕾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ry Awards and Their Impact 114

徐德荣 修小力

论儿童幻想小说翻译中的童趣再造 127

学术动态

王少爽 高 乾

翻译研究的认知心理范式探索

——《心理语言学与认知科学视域下的口笔译探究》述评 143

林嘉新 周子淳

其人·其诗·其译：穆旦研究的系统化探索

——《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评介 151

译诗“可以兴，可以怨”¹

——谈江枫先生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oetry Translation by Jiang Feng

罗选民

LUO Xuanmin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江枫先生的诗歌翻译理论和诗歌翻译实践，尽管他提倡的“形似而后神似”并非是他的创作，但他将这一诗歌翻译的主张最大化地运用在他的诗歌翻译之中。江枫强调，真正要把握和领悟这一诗歌翻译的主张，需要有大量的诗歌翻译实践和对诗歌翻译的批判性思考。本文对江译的形神兼备、意象词、颜色词的处理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他的诗歌翻译理念对当今诗歌翻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江枫；诗歌翻译；形似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oetry translation by Jiang Feng. Though he is not the first one to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being alike in form first and in spirit second”, yet this principle has been demonstrated mostly in his translation of poetry. He emphasizes that the mastery of the principle of poetry translation largely depends on constant poetry translation practice as well as critical thinking.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how Jiang combines the being of alike in form and spirit and, delicately handling of those vocabularies of images and colors in his translation. Jiang's inclination to poetry translation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oetry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China today.

Key words:

Jiang Feng; poetry translation; formal fidelity

1. 引言

诗歌翻译，犹如皇冠上的钻石，璀璨夺目，身处高位，令人敬畏。从事翻译者，敢做并能做好诗歌翻译的恐寥寥无几。翻译诗歌，译者仅仅具备学识、学养和双语技能还不够，译者通常还要兼有诗人禀赋才行。只有这类译者知道那些可以使诗能

称之为诗的特质,并使这些特质尽可能地在译诗中得到保留,即便其手法是“偷梁换柱,移花接木”。译者此时可以作为原诗作的代言人,是原诗人的研究专家。其译诗自然是再度创作,是西方诗歌在中国的后起生命,或者说,是西方诗歌在中国的“投胎转世”。我以为,江枫的译诗便达到了这种境界。

江枫的译诗之精妙,译界广为推崇。他的代表译作应该是《雪莱诗选》和《狄金森诗选》。这些译作让他于1995年成为我国“彩虹文学翻译终身成就奖”外译中唯一得主。

2. 江枫的《西风颂》片段翻译之比较

雪莱的《西风颂》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它把意象、色彩、声音和诗人的哲学思想、道德情操和政治抱负等融为一体,气势磅礴,情感炙热,意境高远,耐人寻味。在诗歌的形式结构上,雪莱结合但丁《神曲》中的三行体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诗体,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刘守兰 2003: 317)全诗实际上由五首十四行诗构成,每首诗有五个诗节,其中四个三行诗节,一个双行排偶句,其顺序为3、3、3、3、2,韵脚为aba、bcb、cdc、ded、ee,这样的韵式能很好地表达和抒发情感的高潮。这首诗有多种值得推荐的译本,其中王佐良和江枫的译本是我喜欢的。但我认为江枫的译本最准确、最耐读。下面我们来看《西风颂》的第一首:

原文:

O wild West Wind, 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
Thou, from whose unseen presence the leaves dead
Are driven, like ghosts from an enchanter fleeing,

Yellow, and black, and pale, and hectic red,
Pestilence-stricken multitudes: O Thou.
Who chariotest to their dark wintry bed

The winged seeds, where they lie cold and low,
Each like a corpse within its grave, until
Thine azure sister of the Spring shall blow

Her clarion o'er the dreaming earth, and fill
(Driving sweet buds like flocks to feed in air)
With living hues and odors plain and hill:

Wild Spirit, which art moving everywhere;

Destroyer and preserver; hear, O hear!

(Shelley 1993: 443-444)

王佐良译文：

啊，狂野的西风，你把秋气猛吹，
不露脸就将落叶一扫而空，
犹如法师赶走了群魔，
赶走那黄绿红黑紫的一群，
那些染上了瘟疫的魔怪——
啊，你让种子长翅腾空，
又落在冰冷的土壤里深埋，
像尸体躺在坟墓，但一朝
你那青色的东风妹妹回来，
为沉睡的大地吹响银号，
驱使羊群般的蓓蕾把大气猛喝，
就吹出遍野嫩色，处处飘香。
狂野的精灵！你吹遍了大地山河，
破坏者，保护者，听吧——听我的歌！
(王佐良译 1980: 159)

江枫译文：

哦，旷野的西风，秋之实体的气息！
由于你无形无影的出现，万木萧疏，
似鬼魅逃避驱魔巫师，蔫黄，黝黑
苍白，潮红，疫疠摧残的落叶无数，
四散飘舞；哦，你又把有翅的种子
凌空运送到他们黑暗的越冬床圃；
仿佛是一具具僵卧在坟墓里的尸体，
他们分别蛰伏，冷落而又凄凉，
直到阳春你蔚蓝的姐妹向梦中的大地
吹响她嘹亮的号角（如同牧放群羊，
驱送香甜的花蕾到空气中觅食就饮）
给高山平原注满生命的色彩和芬芳。
不羁的精灵，你啊，你到处运行；

你破坏, 你也保存, 听, 哦, 听!

(江枫译 2010: 94)

雪莱是 18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其诗歌洋溢着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 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哪怕他处在人生的低谷时期亦是如此。他的诗歌意境优美, 激情洋溢, 描写精微, 而且充满了音乐感。在翻译中, 王佐良和江枫基本上都保持了原诗的结构, 韵脚也运用得很好。王译看上去空灵飘逸, 而江译看上去则气势磅礴。王译的可读性更强, 但江译在可读的基础上, 忠实度更高。关于这一点其他学者已有定论, 如喻云根在论述《西风颂》的不同英译本时做如是说: “相比之下, 江译偏离最少。” (喻云根 1996: 66) 这个评价应该是十分客观的。

江枫主张译诗形神兼备, 在这个前提下, 形似是关键, 形似而后神似。他反对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对文学翻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就文学翻译而论, 深化不得, 浅化不得, 只能力求对等, 才能力求忠实。也不能因为对等难求, 便放弃追求, 忠实不可轻易达到, 便不求忠实。” (江枫 2009: 4) 其实这种标准, 不仅仅适用于文学翻译, 还适用于宗教翻译、哲学翻译。正由于江枫在自己的翻译中贯彻了这个原则, 加上他的双语驾驭能力, 他的翻译在意象方面更加具体, 在意境方面更加高远, 在颜色方面更加绚丽, 在表达方面更加准确。

诗歌第一句的第一个短语 “O wild West Wind”, 王佐良 (也包括其他译者) 将其翻译成 “狂野的西风”, 而江枫则将其译为 “旷野的西风”。江的处理使描写对象的空间为之扩大, 主客体融为一体, 为后面 “吹响号角” 从而成为 “不朽的精灵” 的西风做了铺垫。在翻译 “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 时, 王佐良的 “你把秋气猛吹” 是意译, 很好地表达了西风的猛烈。相比之下, 江枫的 “秋之实体的气息” 似乎显得有些乏力。但如果我们把分析放在诗歌篇章之上就能发现, 江枫采取的是直译, 不同的是, 他对句末的标点做了处理, 改变了句式, 这一句在译诗中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感叹句, 与诗歌结尾的感叹句产生呼应: “……给高山平原注满生命的色彩和芬芳。 / 不羁的精灵, 你啊, 你到处运行; / 你破坏, 你也保存, 听, 哦, 听!” 如果将江译的 “旷野的西风” 改成王译的 “狂野的西风”, 就不能与江译其他诗句和谐地相处。因为在这段翻译中, 江枫的表述虽然没有做渲染, 却暗示西风之浩荡不是骤然而至的, 它是持续的, 发之于毫末的。

在江枫的翻译中, 颜色词的处理极为精妙, 在这一点上, 所有《西风颂》英译版本没有可以与江译比肩的译文。如前面提到的诗句 “Yellow, and black, and pale, and hectic red”, 江译为 “蔫黄, 黝黑, 苍白, 潮红” 这些带有异质、斑斓夺目的汉语组词, 意象鲜明, 让读者感到耳目一新, 拍案叫绝。译者的创造性在其中得

到了充分的表现。其实这就是江枫先生提到的形似而后神似的具体表现。“我所强调的形式，而且是确实是只要做得到相似便能实现神似的形式，是使得一首诗得以形成为诗的全部语言材料，尤其是象征意义浓厚的实词，和造型能力强劲的修辞手段，比喻。”（江枫 2009：260）我想如果每位译者都以该观点作为译诗的指导，类似的译文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现代汉语的发展一定能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3. 江枫的文学翻译观

江枫的文学翻译观是：“形似而后神似。”（江枫 2009：5）他认为，“翻译，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别。对于正确的译文，没有人介意是直译、还是意译。世界上没有不意译的直译，也没有不径直表达原文的意译”。（江枫 2009：29）他的这一观点来自实践。他说：“……对于文学翻译，在争取实现形神兼似的努力过程中，在形神不可分割的前提下，形似是关键，形似，而后神似。”（江枫 2009：3）我同意江枫先生的这个观点。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仅赞同形似，神似也在他的考虑之中，不过只是在“孰先孰后”上，他突出了形似。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否则，一些望文生义、妙笔生花的译文就可冠以“神似”之名而招摇于翻译圣殿。我曾在《衍译：诗歌翻译的涅槃》一文中提到：“在通常的情况下，直译为先，意译为次。唯有直译，原语的异质和原文的精神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原文的文化能得到传播。当然，我讲到的直译不是绝对的，而是指以直译为主的翻译。一般说来，任何译文都是直译中有意译，意译中也会有直译。”（罗选民 2012：62）一言以蔽之，直译不是“硬译”“胡译”，直译犹如戴着枷锁跳舞，追求形似，兼顾西东，即兼顾原文和译文、形和义，然后在此基础上追求神似。人们不能因为这样做麻烦和困难，就放弃直译和形似而直奔神似。那样产生的“神似”是不靠谱的，虚幻的，自娱自乐的。电影 *The Waterloo Bridge*，被译成《魂断蓝桥》而深得好评。这是因为这个译法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和审美情趣，能达到商业广告的宣传效果。但读者永远无法将“蓝桥”与“滑铁卢桥”联系起来，脑海中的意象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阿甘正传》（*Forrest Gump*）这个译法就很好，看似译者加了两个字，但故事情节包含了这个寓意。同时，该译名能与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产生互文效果，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异域的社会底层小人物如何通过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1963 年上映的西方电影 *Blood and Sand*，如翻译成《血与沙》，是直译，形似达到了；如果翻译成《碧血黄沙》便是形神兼备的翻译。一仆两主（英文和中文），均侍候得舒舒服服。英文中的两个单词的首字母 B 和 S，在翻译中对应了中文的“碧”与“沙”，不仅音节上达到契合，在语境上也与电影中硝烟弥漫的战场环境相吻合。

“形似而后神似”并非由江枫先生首次提出，他本人就在文章中提到这不是他的天才创造。但他坚信这是一个正确的翻译标准，但只有勇于思考并通过千锤百炼的翻译实践方能得其真谛。他从翻译批评、翻译实践（诗歌，小说等）、翻译理论等多个方面对这个理论加以阐释，加以论证，加以拓展，其目的就是要让这个看似简单明了的翻译标准，把绝大部分翻译者从半解、不解、误解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这既是对翻译理论的澄清，也是对翻译实践的拨乱反正。

4. 结语

江枫是一位执着的诗歌翻译家，他为诗歌翻译辩护，为诗歌翻译理论辩护，眼里容不得“沙”。他言语犀利，如匕首投枪。但凡他认准一个方向，便披荆斩棘，奋力前行，哪怕这份执拗和较真会给自己带来累累伤痕。他因此得罪了一些译者和学者。在诗歌翻译上，他自傲，但不自负；他的自傲是有底气的，虽然在我看来，不自傲、宽容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诗歌翻译是“真金不怕火炼”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后来的人们会记得他翻译的雪莱、狄金森，他优美的诗歌翻译会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他就像自己翻译雪莱诗中坚强的雄鹰：

坚强的雄鹰！你高高地飞翔
在云雾弥漫的山巅丛林之上，
披沐着晨曦的璀璨的光明，
像庄严的行云，而当夜幕
天渊降临，你傲然不顾
狂风暴雨壁垒森严的迫近。
(江枫 2010: 49)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就是说，诗可以激发情感，可以了解天地万物与人间万象。用在翻译上，我们可以说，译诗也可以兴，可以怨。因为译诗也可以充分激发情感，抒人间万象，激励人们忘记痛苦，追求光明。但这些译诗必须是建立在形似而后神似的基础之上。查良铮译普希金的诗，王佐良译彭斯的诗，江枫译雪莱的诗，莫不如此。这些诗歌脍炙人口，代代流传，它们融入中国文学土壤之中，并沉淀成为文学精品。

注：江枫先生于2017年10月17日在北京逝世，谨以此文作为追忆。